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太平天国人物 研究

苑书义 林言椒 编

巴蜀书社

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

苑书义 林言椒

巴蜀书社

一九八七年 成都

特约编辑：乔还田

封面设计：李文金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

苑书义 林言椒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0.25 字数400千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 190册

书号：11329·26

定价：3.90元

ISBN7—80523—034—x/k·8

目 录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述略·····	苑书义 林言椒 (1)
论洪秀全·····	沈 元 (79)
洪秀全论·····	罗尔纲 周 邨 (100)
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	王庆成 (156)
如何评价杨秀清·····	郭毅生 (198)
对“天京事变”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 ——兼与郭毅生同志商榷·····	周自生 (228)
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	贾熟村 (256)
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韦昌辉·····	梁杉人 (297)
评韦昌辉·····	苏双碧 (316)
试论石达开从定都天京到内讧前夕的活动·····	王学庄 (340)
石达开大渡河被俘真相·····	苑书义 (352)
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	王庆成 (376)
论洪仁玕·····	路 遥 (401)
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李竞能 (426)
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	王汝丰 (446)

关于李秀成写自传的问题.....罗尔纲（470）
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赵矢元（487）
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罗尔纲（501）
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苑书义 吕翼祖（508）
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李 晴（524）

附录:

评李秀成自述.....戚本禹（563）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报刊文章索引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书目索引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述略

苑书义 林言椒

当中国刚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在神州大地上就掀起了太平天国革命风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造就了许多农民领袖，产生了自己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这些杰出人物身上，凝结着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和种种弱点，功过参半，瑕瑜并见。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和悲剧式英雄，既亲手把农民战争推向高峰，又因自身的失误而无法引导革命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研究和正确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有助于了解太平天国成败得失的全貌，揭示这次农民运动所产生的复杂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规律。例如，弄清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早期活动，就可以基本上把握革命的酝酿和准备的情况。对杨秀清的功过研究得越透彻，就越便于了解前期革命的全局。系统地总结李秀成的活动，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后期革命的发展变化。如此等等。

研究和正确评价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作为整个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向成为历史学界所注目的课题。建国以来，历史学界对于太平天国重要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九四九——一九六四年是第一个阶段，一九六四——一九七六年是第二个阶段，一九七七年以后是第三个阶段。

建国后的十五年间，广大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系统地研究了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洪仁玕和李秀成等人的功过是非，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就这些人物的评价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范文澜著）、《太平天国史稿》（罗尔纲著）、《中国近代史稿》（戴逸著）、《太平天国》（牟安世著）等专著和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二百九十多篇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界辛勤耕耘的结晶。其中有些论著对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和李秀成等人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有些论著则有拔高洪秀全、否定石达开、韦昌辉、洪仁玕的倾向，反映了历史学界认识上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戚本禹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李秀成的运动，宣判李秀成为叛徒，把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李秀成的同志打成叛徒辩护士。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是十年浩劫的先导。从此，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虚假的繁荣和真正的窒息。“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以古喻今，随心所欲地曲解历史事实，“神化”洪秀全，“鬼化”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等人，把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糟踏得面目全非。

对于太平天国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只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恢复了生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历史学界拨乱反正，清算了“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的罪行，并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洪仁玕和李秀成等人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热烈的讨论。在此期间，历史学界不仅相继在南京、苏州、广州、广西、四川石棉、石家庄和金华等省市多次召开了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而且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稿》

(刘大年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苑书义等著)、《太平天国兴亡史》(茅家琦等著)、《太平天国人物论集》(苏双碧著)、《石达开》(王庆成著)、《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太平天国论文集》(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两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王庆成著)等论著和发表了四百一十多篇有关太平天国人物的论文,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历史学界分别把洪秀全从神还原为人,把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等从鬼域请回人间,进行了历史的评价,除了继续探索以往争论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外,又经过新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这个阶段的研究和讨论比起以前来,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关于太平天国重要人物的评价,目前虽然历史学界的看法还远非一致,争论还正在继续,但是三十多年的研究和讨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了把这一研究和讨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必要对过来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肯定成绩,抓住要害,明确方向。正是基于这一设想,我们不揣冒昧,编了这本论集,呈献给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

一、洪秀全

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埗一个中农家庭。青年时期的洪秀全,曾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多次赴广州应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他同封建仕途决裂,阅读《劝世良言》,开始拜上帝。翌

年外出传教，辗转到达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间，他在家乡埋头于一种以拯救苦难群众为宗旨的著述。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他第二次来到广西，进入紫荆山区。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他亲自领导发动金田起义，被拥立为天王。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他定都天京，派兵北伐西征。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天京内讧。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因病逝世，不久南京陷于敌手，太平天国失败。

历史学界几乎公认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思想家和政治首领，他的言行同这场农民运动息息相关。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其它种种因素，历史学界对洪秀全的评价还存在着不少明显的分歧。

1 洪秀全何时确立反清思想

要弄清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就需要把洪秀全的言行和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鸦片战后中国的社会实际决定着洪秀全的早期思想面貌，而洪秀全的早期活动则是检验他的早期思想倾向的唯一标准。洪秀全从迷恋科举功名到形成反清革命意识，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变成农民革命领袖，经历了艰苦的探索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鸦片战后中国农民逐渐革命化的缩影。不论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历代农民起义的传统思想，都不曾使洪秀全革命化，只有日趋激化的阶级斗争才把他推向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现在的问题是，洪秀全何时确立反清思想？六十年代初，历史学界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

罗尔纲等认为，早在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洪秀全就写了《龙潜》和《斩邪留正》等诗篇，并做了升天受命的“异梦”，

表明他的内心深处业已萌发了叛逆思想，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同科举仕途决裂，开始借用基督教的某些形式和辞句筹建革命组织拜上帝会，并创作《剑诗》，表达了实行武装反清的决心；一八四五年——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洪秀全写出几篇论文，在拜上帝的宗教形式下创立了一种以朴素的平等思想为内容的农民革命理论，其中《原道醒世训》贯穿了经济平等思想，《原道觉世训》指出了战斗目标^①。

沈元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证明洪秀全在一八三七年业已萌发反抗思想的《龙潜》和《斩邪留正》两首诗，并非为洪秀全所作，或者即使作过，也断不是在一八三七年。一八四三年洪秀全虽然从赴考失败就放弃了对功名的幻想，但也只是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企图通过宗教宣传而使一切人改邪归正的办法，来普渡苦难的众生。他这时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革命意识。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间，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改邪归正》等作品，“一方面对现实秩序强烈憎恨，热烈地呼吁光明的未来世界；另一方面却又对现存秩序无可奈何，用非常善良的、但也是最肤浅最愚蠢的道德自我改善理论来欺骗自己。”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他第二次来到广西，进入紫荆山区，这时正是广西农民起义进入高潮的年头。冯云山的影响，与农民的广泛接触，促使他认识到：“实现天国的途径不应当是调和，而应当是不调和，应当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些力求实现天国的群众身上，他们愿意而且能够用武器的批判来消灭他所批判的世界。这种大大前进了一步的新认识表现在这时他所写的新作品《原道觉世训》中”。可能写于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的《原道觉世训》“是一篇富

^① 罗尔纲、周郁：《洪秀全论》，《江海学刊》，1963年第4期。

有战斗性的文献。在这里第一次强调地提出了一个‘蛇魔’的概念，把它作为罪魁祸首而影射着清帝；第一次明确地划分了正和邪两大阵营。”一八四八年冬他与冯云山、洪仁玕一起写定《太平天日》，创作了一个关于洪秀全“异梦”的完整神话故事，“作为动员群众起来革命的根据。”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大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写了《近世》诗，“这首诗洋溢着这位革命领袖充沛的信心和豪迈的气概。”“由于革命形式的推动，经过一八三七年以来的十三年艰苦探索，他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变成农民革命的领袖。”^①

黎斐然提出了介于罗尔纲与沈元之间的看法。他认为，一八四三年“拜上帝会”的创立，客观上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推动的，在主观上洪秀全出于要改变黑暗的现状的愿望。但他没有明确的革命思想作指导，提不出符合当时农民要求的革命理论和口号。初创的拜上帝会的主要信念是“向‘耶稣赎罪，悔过从善，……’”。 “‘悔过从善’的思想，既没有反映当时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也没有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相反地把群众带进飘渺的宗教幻想中，对革命没有什么好处，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反动统治反而有利。”一八四四年外出宣传活动的失败，“对洪秀全来说，却是宝贵的革命实践活动”，“促使他在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在花县故乡痛苦地思索，从理论上探索革命道理。这两年中他写成了《原道觉世训》等五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充分发挥了农民革命理论，奠定了他的革命思想基础，从而把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理论发挥到高峰。”一八四七年他第二次来到广西，领导拜上帝会众捣毁象州甘王庙偶像，“提高了革命威信，拜上帝会向附近州县发展。地主阶级被迫起来反扑，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一八四八年他和

^①沈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冯云山写了《太平天日》，制造出一个“上天受命”的故事，作为动员群众武装起义的根据。这个故事“富有十分鲜明的革命思想”^①。

关于洪秀全何时确立反清思想的讨论，在十年浩劫期间，由于“神化”洪秀全而被迫中断，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又渐渐苏复、活跃起来，及至一九七九年甚至出现一次高潮，这一年相继发表了四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黎斐然的《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剖析》^②；徐绪典、马大正的《论洪秀全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拜上帝会》^③；王庆成的《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④、王育民的《金田起义前和后洪秀全宗教世界观的重大变化》^⑤。徐绪典等的论文，进一步发挥了罗尔纲的观点；黎斐然的论文，充实和深化了他在文革之前对洪秀全初期革命思想的想法；王庆成的论文讨论了洪秀全早期思想活动的发展及其性质；王育民的论文，提出了一种前人未曾论及的见解。

王庆成的论文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洪秀全早期活动的性质。第二、洪秀全早期思想的性质。关于第一方面，论文认为：洪秀全在1843年开始信拜上帝，并不表明他在这时已开始立志革命；洪秀全从宣传拜上帝到酝酿反清起义，有一个过程。洪秀全在自身前途受到窒息并对旧的世界、旧的信仰产生怀疑之时，接受了一种新的说教——梁发的《劝世良言》，他相信人们只要拜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世界清平。为此，他抛弃功名仕进之路，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拯救一个邪恶的社会而真诚地去作一名

①黎斐然：《洪秀全初期的革命思想》，《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

②黎斐然：《学术月刊》，1979年第2期。

③《文史哲》，1979年第4期。

④《历史研究》，1979年第8、9期。

⑤《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1册，中华书局 1981年版。

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从1843年至1847年夏天重游广西以前,洪秀全的言论、著作、活动都是这种宗教、道德救世的性质。1847年春、夏洪秀全在广州受洗不成,再次到广西在紫荆山见到冯云山,见到业已存在并发展着的拜上帝会组织,在广西遍地烽火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从对邪恶社会的批判转变为对邪恶社会的反抗,从宗教道德救世转变为酝酿反清武装起义。此后所写的《原道觉世训》和所形成的《太平天日》故事的素材,反映了洪秀全这种政治态度的转变。关于第二方面,论文分析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认为这些作品不存在反抗的倾向,不存在“四大平等”的内容。《原道救世歌》揉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是当时洪秀全的‘救世’方案。其中被认为是宣传政治平等的语句,联系上下文来看,多源出于宗教和《劝世良言》。关于《原道醒世训》,作者认为洪秀全在这里对社会提出了把凌夺斗杀之世改造为公平正直之世的要求,思想有所深化,较《劝世良言》有所突破,但仍把实现“大道”之途归结为人心的修养。作者引用了恩格斯对平等观念的历史分析,认为洪秀全的这些著作中并没有近代意义的平等思想。1847年以后洪秀全走上密谋革命的道路,对原先的思想有所补充发展,转而采取了某些适合于农民战争的利益和需要的观念,他所设计的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和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归于“主”的专制社会。

王育民认为,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之前若干年间,全盘接受了梁发的《劝世良言》,信奉和宣传了一个十足正统的基督教,是绝谈不上从原始基督教吸取了任何革命营养,也绝谈不上是利用基督教为革命进行了准备工作。他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和《天条书》只不过是根据《劝世良

言》和《圣经》教义所写的宣传基督教的宣传书籍。他“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金田起义是被团练勾结官兵逼迫的结果。所谓“奇梦”以及《斩邪留正》和《剑诗》等诗篇，都是金田起义之后编造出来的。

对洪秀全早期思想和早期活动的不同见解，实际上就是对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过程的不同认识，并部分地关系到对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估价，无疑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2. 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关系

洪秀全思想中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似无异议，问题在于这种宗教因素在洪秀全思想中占有什么地位，起着什么作用？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弄清洪秀全的思想全貌及其与太平天国兴衰的关系，因而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出现了各抒己见的局面。

新中国历史学界批判了外国侵略者关于基督教造成了农民领袖洪秀全，诱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谬说，阐明了基督教不曾使洪秀全革命化而革命家洪秀全却使殖民主义者所要传布的基督教转化到了它的反面的真理。当然，人们对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看法，也并非是完全一致而没有分歧的。

第一个问题：洪秀全是否改造了基督教？

沈元认为，洪秀全曾经利用了基督教神学世界观中的一些因素，将其改造为农民革命的理论武器；他把基督教“改邪归正”的伪善的道德，改造成了“斩邪留正”的革命道德；他还采用了某些基督教的宗教仪式，来作为团结和教育革命队伍的手段^①。李泽厚也认为，洪秀全思想的核心和主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

^①沈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革命思想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创造性，就在于他借来了一个西方的上帝观念来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他把构成宗教体系的观念、情绪和仪式三要素“都注入了革命的内容。‘人皆兄弟’基督教的博爱观念，被注入了农民阶级的经济平均主义和非常原始的平等观。宗教狂热被充实以积压已久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欲求。更突出的是，宗教戒律仪式被改造成相当完备的革命军队所需要的严格纪律。”①

朱学勤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洪秀全从来没有改造过基督教。宗教只能用唯物主义来批判，而不能用唯心主义来改造。任何宗教被改造之后还是唯心主义的宗教，除非完全扬弃推翻而另立思想体系。洪秀全的思想以新教为基础，还接受儒教及道教的一些影响，实际谈不上改造。他只把宗教中（佛、耶、回等）神和妖魔的对立和斗争的虚无说法加以利用，以消灭妖魔为战斗口号来把矛头指向清朝统治阶级。这点还是和群众自觉的革命要求相适应的。”②

第二个问题：洪秀全是否接受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

胡绳认为，《劝世良言》给了洪秀全强烈的影响，“最引起他注意的大致是这样的两点思想：一、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一切为人所崇礼的对象都是妖魔；二、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洪秀全从这两点思想中发现革命的内容，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古罗马社会中，基督教最早建立的时候，奴隶大众正是拿着这样的宗教思想当做他的斗争武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也由原始基督教的平等主义思想而

①李泽厚：《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②朱学勤：《试论太平天国的失败与宗教的关系》，《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激发了战斗信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奇迹’，欧洲历史上被压迫人民曾经用来宣泄他们的反抗情绪的宗教思想，通过资产阶级传教士的媒介，在洪秀全这一个人的身上，和中国农民大众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了。”^①

沈元则持否定意见。他认为，“洪秀全的平等思想与原始基督教有共通之处，但并非来自原始基督教。事实证明，洪秀全的基督教知识之源头——《劝世良言》里并没有什么原始基督教；西方殖民主义者带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也决不是什么原始基督教。十九世纪中国农民不能同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简单地类比，他们进行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各不相同。”^②戎笙也认为，“《劝世良言》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没有也不可能有反对奴役统治的思想，它是一部十分反动的具有殖民统治思想的基督教（新教）的传道书。如果洪秀全完全接受了它的宣传，就只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可能堕落成为梁发那样的败类。他如果信仰了这个上帝，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反抗思想，更不可能发动和领导一场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③

第三个问题：洪秀全的宗教起了什么作用？

一般认为，洪秀全的宗教在前期发挥过积极作用，到了后期就成了促进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李泽厚说：洪秀全“这种重视宗教宣传（太平天国的思想教育）和仪式规定（太平天国的组织纪律），使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前赴后继，不可阻挡。一方面，借助于一种新的宗教形式，的确改变了封建农民的保守、散漫、因循守旧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发动、组织起

①胡绳：《太平天国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关系》，《学习》，1949年第1卷第1期。

②沈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③戎笙：《洪秀全与〈劝世良言〉》，《〈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来成为一支革命大军，另一方面，又只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现实需要，舶来品的基督教形式才可能起这样的作用。”但是，这种“以宗教意识为动力和主干的农民革命思想没有进一步发展方向。”到了后期，由于洪秀全“在基本思想和政纲政策上仍然顽固坚持、并愈来愈迷信他那一套非科学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说教，他不是如实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而把革命的成败归咎为是否忠诚于宗教信仰，抱着他那些僵死的教义和前期的旧经验不放，甚至最后在改国名、朝名、玉玺上面作文章，以期拯救危局，改变形势，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①沈元认为，“洪秀全的宗教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这是因为它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的，是反映了农民群众的革命要求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已把人的因素不断地灌输到宗教中去；他看到革命迅速而巨大的胜利，反而越发相信神的巨大权能，越发虔诚地信奉宗教，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神的身上。结果“拜上帝教是洪秀全自己创造的，最后却转化为一条把他束缚至死的绳索。”^②

与此相反，戎笙认为，宗教对农民革命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程度罢了。“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用宗教神学观点解释战争胜败的原因，预言革命发展的前景，估计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回答前进中所碰到的一切难题。这一切，也许能暂时起到一点激励士气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对革命事业所起的作用，都是消极的，完全突出了根本不存在的上帝的作用，引导人们依靠上帝的默佑。”^③

①李泽厚：《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②沈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③戎笙：《洪秀全与〈劝世良言〉》，《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